

音乐大神赵梅伯在西安

人物春秋



赵梅伯

被誉为“一部活的中国声乐史”的已故中国近代音乐先驱赵梅伯先生，是二十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著名的声乐家、合唱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他是第一个赴欧洲留学声乐、第一个将中国民歌介绍到西方的人，也是第一个在欧洲乐坛上为中国人夺得歌唱头奖的人，还是演唱古典、浪漫、近代歌曲和东方民歌的第一人。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音乐大神，40年代初，在西安创办了西北音乐学院，地址就在紧挨贡院门东边的早慈巷，省立西安第一中学（今西安市四一中）校内。

赵梅伯（1905—1999），生于宁波奉化，早年名章伦，号梅伯，以后一直以号为名。就学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1936年回国，被聘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声乐系主任。他是中国现代音乐事业的先驱者，二十世纪罕见的中国音乐教育家，也是少数能将声乐与指挥合唱技能连为一体的专家。30年代初就已经成为世界声乐界的男中音歌唱家。

赵梅伯天性聪颖，天赋极高，小时候便能吹笛拉琴，自幼念私塾，音乐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0岁时就成为校园歌手。他不但是音乐天才，而且在体育上也不输他人，上中学时是学校里的足球健将，网球、田径方面都高人一筹。1921年，赵梅伯从宁波斐迪中学

毕业，考入沪江大学。在沪大“新生之夜”晚会上，他被推派代表新生独唱，一往事事顺利的他，却在唱完后不知因过分紧张还是老天爷给他提个醒，他竟在台上摔了一跤，引得全场哄然大笑，从此“跌跤之赵梅伯”便闻名全校。

这一跤，预示了他音乐之路的艰难。由于父亲竭力反对他学音乐，并断绝了他在沪大的学费。为赚取学费，赵梅伯做过“小贩”，到上海港的外轮上向船员兜售中国的商品，为音乐老师做助理。实在无奈，便辍学到杭州蕙兰中学作音乐教员，还在外国人组织的合唱团中担任独唱演员，又指挥杭州最大的教会合唱团——杭州乐正社合唱团。就这样，他一边教书一边学习音乐，同时并修完了沪江大学的学业，于1927年获得学位。

这一跤，让赵梅伯走过青春，走过艰难，初露头角。1929年，24岁的赵梅伯应德国高亨唱片公司之邀录制唱片，演唱中华民国国歌（国民党党歌），并向全国播放。并与上海音乐界知名人士一起发起成立上海音乐协会，后来还被推为协会组织部主任兼声乐科主任。

这一跤，还把他跌进了世界最高音乐学府之一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这个学校，投考极难，而赵梅伯竟被录取于正班（非外国人班），成为当时第一个学声乐的中国人。

这一跤，让他参加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公开考奖，也历尽坎坷。这种公开考试，极其严格，惨苦至极。只有满分考取头奖，才能毕业，考分获二奖，需再练一年后重新考试。他前两次皆与头奖失之交臂。终于，第三次他抱病参加并获得头奖（罗雷亚学位），兼获爱尔兰奖学金。华人在欧洲最高学府中学音乐而享有此殊荣的，赵梅伯为第一人。

1934年2月，赵梅伯应邀赴美，纽约全国广播电台NBC·WEAF为他举行广播音乐会。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听到如此知名的东方人的演唱”。之后，在美国纽约等数十座城市举办独唱音乐会，在美国掀起了赵梅伯热。60年代末他再赴美国，还荣膺“美国杰出教育家”称号。至此，他终获大名，成为享誉中外乐坛的音乐大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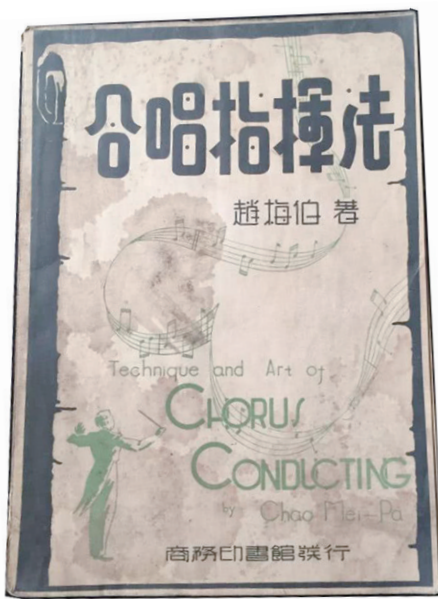
1936年，赵梅伯由欧美载誉回国，被萧友梅聘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授及主任。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当时被困上海的赵梅伯，坚守民族气节，绝不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他拒绝了南京汪伪政府要他就任南京音乐学院院长职务的邀请，随后便携妻女秘密逃离上海，冒着生命危险，闯过一道道日军封锁线，千里跋涉，辗转到达西安。在西安他创办了西北音乐学院，开始了他把音乐之花播种西北大地的又一个辉煌时期。

西北音乐学院是在当时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创立的，并得到西安当地军政要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当年西北音乐教育极其落后，一千零八所中等学校，音乐教师约有二分之一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因此，西北音乐学院对于发展西北音乐教育，更负有重大使命。学院于1943年8月开始招生，学生

多为沦陷区逃亡出来的。凡考试主科能达80分以上者，均享受免学食费优待。他的办学宗旨不只是培养人才，而且更注重提高西北音乐教育水平，因此，在设立专修科的同时，还设有师范科。日军占领上海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被迫改为汪伪国立音乐学院，不少爱国师生愤然离校，相继流亡到西安，使学院充实了一批高质量的授课老师，令赵梅伯和学生感到十分欣慰。

西北音乐学院自1943年建立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停办，时间虽短，但对西北地区的音乐教育却起到了无可估量的、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培养了一批像张树楠这样的音乐人才。在三年时间里，该院曾在西安多次举办音乐会。学生演唱的歌曲都是欧洲最高尚的音乐，有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中文的歌曲，有古典的，也有最新派的作品；有神曲，也有歌剧。有人称赞赵梅伯创建并苦心经营的西北音乐学院是“西北荒漠土地上的一棵音乐萌芽”，称他是“一位不愿屈服在敌人统治下的文化英雄”，并把他誉为“一部活的中国声乐史”。他著有《黄钟史》，较早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音乐及历史。他的《唱歌的艺术》是中国声乐专著中既深入浅出又富有较高实用价值的作品。

1997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庆祝赵梅伯先生从教70周年活动上，中国文联主席、作曲家周巍峙为赵梅伯题写了“歌坛耆宿 乐苑益师”的贺词，上海市音协主席、作曲家桑桐题写了“梅香隽永 柏树常青”的贺词。而赵梅伯在西安早慈巷创建并苦心经营西北音乐学院的光辉事迹，对于现今的西安人来说，可以说知之甚少，想起来，确实惭愧得让人汗颜。 □朱文杰



往事

见字如晤

“但愿来生我们终日在一起，每天每天从早晨角到夜深，恨不得大家走开。”翻译家朱生豪在致爱人宋清如的信中写道。

你也许以为写信者是热情的性格——事实上，他幼年失怙，家境贫寒，兄弟三人由早孀的姑母照顾。在世人眼中，他性格清孤。若无知己，他宁愿八百里雾野，独自蹒跚。但他遇上了爱人宋清如。朱生豪说：“我爱你就像爱一首诗一样。”

结婚后，夫妻二人回到嘉兴，日子窘困，可依然美满。朱生豪“闭门家居，谢绝外务”，一门心思在家翻译莎士比亚。1943年春节，清如同常熟娘家过年，住了近一个月。雨天，朱生豪等清如返家，后园有一株杏梅，花瓣被雨打湿，他每拾一瓣，就在纸上写一段思念的话。待清如回来，花瓣已集了一大堆，其中一段是：

昨夜一夜我都在听着雨声中度过，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夜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夜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可是这雨好像永远下不住似的，夜好像永远也过不完似的，一点一滴洒在我的灵魂上……

这样的乱世风雨，这份系念使得再冰凉的雨水也只衬出皮肤底下的温热。

“事实上你已成为我唯一的亲人了。”“接到你的信，真快活，风和日暖，令人愿意永远活下去。世上一切算得什么，只要有你。我是，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孩童般的喜悦、亲昵，一片赤诚。他称清如的信为“续命汤”，说世间的苦不算什么，因为他的灵魂不曾有一天离开过她——爱，即是清如的求索和依傍，在那儿，在伸手可及处，有个与自己心灵相契的人，除了他（她），我们无别的愿望，如道光灯罩着一人，周围人物皆隐退。一切都是晦暝布景，只有他（她）是可视的。

“今后不再说诳话欺骗自己了，愿意炼成一个坚强的钢铁样的信心，永远倾向着你，当我疲倦了一切无谓的游戏之后。我不愿说那是恋爱，那自然是比恋爱更纯粹的信念。我愿意懂得‘永恒’两字的意义，把世间的意义放入平凡的生活里，而做一个虔诚的人。因我是厌了易变的世，也厌了易变的自己的心情。”朱生豪信中的这段话描述了超越“男女之欢”的一种爱：借对方承载自己对人世的信与望。

笔短情长，在那个没有电脑手机的年代，有什么比书信更助于一段爱的传达呢？“乡下人”沈从文亦是书信获取张兆和的芳心——“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仅此一句，流芳百世。

婚后，在《湘行书简》中，沈从文夫妻仍是如胶似漆，卿卿我我，写信以“三三”“二哥”等相称，让人称羨。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尽管后来婚姻生活过一些涟漪，但两人始终相敬如宾，共同走完了漫长的岁月。

还有瞿秋白，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之一，学识中西的文化人，在铁骨铮铮背后，对妻子杨之华亦是一腔柔情。1929年他在苏联治病休养期间，写给妻子的信用情至深。

亲爱爱：……稍稍休息几天之后，这种有力的爱，这整个的爱的生命，立刻又开始灌溉他自己，开始萌芽新春的花朵。我俩的心弦之上，现在又继续的奏着神秘的仙曲。……

6年后，他慷慨就义，时年36岁。每一封信笺中，都跃动着真切的一个灵魂，记录着一段见字如晤的亲密交流。

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里记录有这样一个故事：

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如果没有当年的那一封信，就没有这感人至深的一幕，文学史上也不会留下这段动人的佳话。

一代人有一代人表达爱意的方式，从结绳记事到电子通信，科技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老父亲老母亲们都学会用微信了。从“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到“车，马，邮件都慢”，一切通讯的周折成为过去时，就连“写”这个动作都被语音和视频替代了。

虽然多了高效便捷，但是我们疏离了笔墨纸笺。定期清理的短信、微信与频繁更换的手机，使那些存在过的互通歌曲、惦念与分享，那藏在琐碎家事中的时光，如风中叶，零散飘渺。于是，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那些“两地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笔财富。

一纸笺书，有时只为写下那一个名字。横竖撇捺，点提钩弯，那是你的名字。台湾诗人纪弦写过一诗：“用了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轻轻地唤你的名字每夜每夜/写你的名字，画你的名字而梦见的是你发光的名字……”

信，是纸上的山河与故乡，安放着我们相互慰藉的灵魂。 □陈蔚文



朱生豪和宋清如

疫情中的知识与记忆

钩沉

2019年底，中国在迎接春节的同时也遭受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突袭，2020年1月30日，WHO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的袭击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事件已经从地方性事件演变为全球性事件。根据2月20日的数据统计，全球累计确诊75753例，亚洲、欧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等都出现了确诊病例。为了更好地了解历史上如何对抗灾难，很多学者回顾了病毒与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学和艺术文本。历史文本很好地记录和总结了过去对灾难演变、治理机制和复杂性；而文学与艺术文本则通过小说、影视呈现了人类面对灾难来临的恐慌变化。但是，各类文本终究还是充满了虚拟和想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突出了灾难和人类面临的恐慌，最后通过英雄出马拯救了世界。今天读这些文本远不同于在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读它的感受。如今现实让我们变成了文本中的主角。我们在疫情之中，阅读着表达灾难的文本。

面对病毒侵袭，人类的情感会经历多次变化：漠视、如临大敌、恐慌、抗争、希望。2019年12月中旬，发生在武汉的零星病例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很快，由于疫情变化太快，中国发布抗疫指令，全国上下行动起来，将病毒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毕竟，这是关乎到生命的关键。保卫人类生命、保护人类自身是生命伦理的首要原则。在病毒的迅猛来袭和各种消息满天飞的情况下，个体的恐慌不可避免地发生……我们已经从抢购口罩、双黄连中看到这种迹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前，专业一线医疗人员冲在了第一线。无论如何，人们都希望通过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场战争没有一个最后的赢家。人与自然是矛盾的统一体，此消彼长。对于人类而言，自然的发怒对于人类而言都是特定意义上的灾难，但又会留给我们特定的东西。正如《鼠疫》作者加缪提到的，知识、记忆是则我们灾难留给人们的两样重要东西。

从知识角度看，我们需要最快地获取到确定的知识，以便为人类抗争提供必要的知识。我们能够认识病毒而获得新冠病毒感染的病原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疾病防治等科学知识。此外，还有各类与重大疫情与公共危机的认知、应对以及治理机制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也会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在这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中，科研人员无疑意识到了这一

点，通过数据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根据Nature的一个统计数据，截至到2019年1月30日至54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论文发表，这些论文大多涉及及病毒的病原体及传播机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现象，比如论文发表与疫情控制之间的矛盾。论文数据共享与使用的争议来自有问题的数据观，有两种固有的数据观需要反思。第一种是数据只是无意义的、素材。但是，数据本与生命意义相关，是生命及其意义的外化物。数据使用前需要遵循必要的伦理原则事实上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第二种是数据是资源。在这种数据观的引导下，出现上述争议就变得可以解释了。然而，数据不仅是当下的资源，更是留存和重构过去的记忆，合理地使用这些代表生命个体的数据就变得紧迫起来。

另外，灾难也提出了很多与记忆有关的问题。首先从记忆类型角度看，两种记忆形式会被强化。首先是灾难记忆。灾难中，个体与国家都面对不同形式的冲击。对于个体而言，自身遭受到的痛苦以及感受到周围情况导致的心理创伤会演变为创伤记忆；对于国家来说，当灾难过去，整个事件以灾难记忆的形式演变为集体记忆的一个部分，与其他灾难记忆融合在一起内化为国家社会记忆的一部分。其次从记忆数据化角度看，记忆以数字、数据的方式永远存在于虚拟空间。通过自媒体、网络我们看到各类数据信息飞速流动，超过10万+的帖子层出不穷。各种数据文本都是某种民间情绪的数字表达。这些文本滞留在网上，被存储在云端，可能今后难以找寻，却可以在理论上永远存在。这让不同的主体会陷入到希望遗忘与被永远记住的矛盾中。再者从记忆效果看，记忆强化会成为不可忽视的方面。根据一般记忆理论，伴有强烈情感的事件会记得更牢。灾难无疑是最典型的一个形式，灾难产生的各类情绪会强化记忆本身。灾难引发了明显的个体恐慌，其结果是让灾难记忆变得更加牢固，甚至某些伤害细节会严重影响个体的健康心理和社会稳定。这种伴随恐慌情绪的记忆行为需要成为日后抚平的关键。最后，从记忆伦理角度看，需要我们思考什么会被记住和遗忘。灾难过后，我们该记住什么？不能遗忘什么？将什么样的事件、将什么样的人物作为未来记忆的对象呈现出来，这将成为记忆伦理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些逝去的个体生命，那些奋战的身影应该被记住。那些不应该被遗忘的，则应该以反思对象的形式成为理性批判的对象。

不过，上述通过灾难获得的两样东西可能在哲学家的理性面前显得有些脆弱。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演

讲录》指出，人类从历史和经验中学到的东西，就是人类从来不会学到什么。但是，换个角度看或许我们会得到更多的东西。对他的观念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人们学到的绝对过去事物的复制性知识，而是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生命的知识和记忆。就知识内容而言，我们获得的知识需要加以区分。那种针对病毒进行的研究而得的经验知识，应该使得我们有效地对抗疾病，而非成为某种炫耀的产物，从美好愿望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希望这种知识再次被启用；那种基于病毒防范和治理而得的实践知识形成的制度建设、直报系统在面对新危机时可以做到迁移性应用。就知识生产而言，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面对，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数据伦理争议使得知识伦理可能会成为新的问题。另外就记忆而言，我们会遭遇必然的遗忘。集体记忆的消退是必然的却常常被忽略。当我们遭遇重大事件冲击的时候，这种记忆伤痕会随着时间流逝和其他外界因素影响而逐渐消失。克里斯汀·卡恩迪亚（Cristian Candia）已经从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两个角度揭示了集体记忆衰退的机制（《集体记忆和注意力的普遍衰退》，2018）。从记住什么的角度而言，是这样的。任何一个经验性的记忆内容总会被新的记忆内容干扰、取代，旧的事件也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远去。但是，这又构成了我们自身我们面对过去的不同方式，忠实、改变、对抗、逃避和直面成为众多可选择的、面对过去的方式。

除了上述知识和记忆，我们还可以重新反思快速生活的问题和生命自身的意义。此次病毒疫情让我们能够反思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从目前数据看，特大城市快速发展中的一个风险后果。在人员、信息、技术高度集中且飞速流动的城市，病毒也是如此快速地传播。此外，我们通过灾难获得了重新反思生命自身意义的契机。当下由于疫情而产生的隔离是一种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生活状态。这种人为的隔离根本上是为了对抗疫情，让疫情传播风险降至最小。刚开始很多人对隔离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一定意义上，隔离能够让我们原有生活节奏加上休止符，获得一个时间和空间来认识生命构成，重新认识到与家人、他者相处的意义。正如《鼠疫》里面描写的，从前在母亲身边生活的儿子很少关注过她，如今他们在勾起他们回想的母亲脸上的皱纹里却注入了他们全部的关切和悔恨。借助这一中断，我们获得的是重新领悟生命意义的可能性。 □陈庆峰